

台灣重層語系研究—— 以《綠島》及其翻譯交涉為例*

劉威廷**

摘 要

台美人楊小娜的英文著作 *Green Island* 書寫發生於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從英文翻譯為台灣華語市場出版品《綠島》。以華語語系研究與翻譯研究的角度共同觀之，此台灣國族創傷事件在台灣境內與境外藉由重層語系播撒、離散、轉譯而歷時性地歸返台灣場域。英文文本與中文譯本的敘事與用字差異、作者與譯者在美國與台灣不同場域的規則與各自的文化資本與佔位、兩造殊異的讀者群，以及特別是文本牽涉的多種語系如英語、日語、現代中文、閩南語等，及跨語系旅行後的音聲與話語如何在翻譯過程中選擇性的呈現，皆標示著台灣這個重層語系場域裡豐富的翻譯面貌。論文特別針對音聲與話語以及語系翻譯間造成的表意過程的落差進行討論。

關鍵詞：重層語系、二二八事件、翻譯研究、華語語系研究

* 本文初稿宣讀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暨臺文所系教師論文發表會議（2019/6/5），感謝特約討論人黃儀冠副教授寶貴建議。修改後宣讀於 2019 年第三屆台灣文學外譯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台灣文學譯者論壇（2019/11/15），感謝評論人李根芳教授寶貴意見。本文蒙三位匿名評審委員多方斧正，讓本文更臻周延，謹此致謝。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言：台灣重層語系場域與翻譯交涉

台美人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的英文小說 *Green Island* 於美國再現發生於 1947 年台灣的二二八事件，於 2016 年於美國發行英文初版，同年底可說以一種跨境與歷時性歸返的方式從英文「翻譯」為台灣華語市場出版品《綠島》。也就是說，透過此英文（語系）¹原典的撒播（dissemination）至台灣華語語系—二二八事件的起源地與時間上的發生點—台灣的華語讀者透過翻譯中介，再次解讀此美國文學場域生產出的文本與其重繪的歷史事件。就此言之，作者、事件與文本翻譯、讀者、美國與台灣文學場域間的解讀與傳播，以及此文本本身與文本的歷史脈絡牽涉的多種語系（英語、日語、現代中文、河洛語等），標示著「台灣重層語系」概念介入的潛力。

本論文主要以台灣重層語系研究與翻譯研究共構論文視角。藉由殖民重層、語系文學、文化國族主義、翻譯研究、想像的共同體、華語語系研究、國族寓言眾聲喧嘩、語音中心主義、滯後效應、聖化等理論概念，藉此探索與定錨本論文研究視角的框架。²其次，本論文將進行 *Green Island* 與台灣華語市場《綠島》的對比分析，探討英文本與中文譯本的敘事與用字差異、作者與譯者在美國與台灣不同場域的規則與各自的文化資本與佔位、兩造殊異的讀者群、文本牽涉的多種語系如英語、日語、現代中文、閩南語等、跨語系旅行後的音聲與話語如何在翻譯過程中呈現、〈綠島小夜曲〉、官方半文言文告、多語系（中文、英文、日文）場景、譯者的翻譯策略等原文與譯本間的對比分析與相關翻譯理論的探討。

¹ 對臺灣語境而言，關於英語是否可歸類為（後）殖民性質之「語系」，詳見後文討論。

² 為探索台灣重層語系研究的在地論述可能，本文接合並「翻譯」許多源自非台灣脈絡、系統（system）的理論，或有便宜行事地將之去脈絡又再範疇化於台灣場域之嫌疑。然這些理論皆或多或少與此文探索之臺灣重層語系產生有機連結。特別是在（後）殖民層次的思考，這些理論共構出具有分析潛力的認識論，本文也以《綠島》文本擴展或反思某些理論（如華語語系研究與德希達對語音中心主義的看法）。故本文冒理論挪用或理論旅行之名，將這些理論視野納入此論述的對話。

（一）台灣重層語系場域

負載著複數殖民歷史的台灣，從史前時代到南島民族，政治上之後經歷西班牙、荷蘭、明鄭、大清帝國、日本帝國、國民政府統治，語系上的歷時性變遷亦承載著南島語系（Austronesian-phone）、荷蘭語系（Dutch-phone）、華語語系（Sinophone）、日語語系（Nippon-phone）、英語（語系）（Anglophone）等。在傳教士的宣教功能以及進入全球化時代後，英語語系在台灣在地文化、媒體的傳播與共構上亦扮演重要角色。多重語系之間的交涉，也已展現於台灣的重層畫布上。許多前行研究者如史書美、王德威、詹閔旭、徐國明、黃美娥、陳培豐、黃儀冠等³對華語語系本身以及其他語種間的交涉業已提出細緻、豐富的論述，但尚未將語言/語種間的交涉現象以殖民或後殖民視角框定為「語系」間的動態「重層」關係⁴，亦未將翻譯研究相關論述與理論連結至此概念。因此，將先行研究者於各個語系以及語系間的研究成果與潛在研究模式加以框定於此論文的「台灣重層語系研究」概念便是筆者所欲拓展的目標。本文不可諱言對自身設定的理論框架具有許多可供討論之處。首先，台灣境內或擴散到台灣境外「語言」間的互動（此處借用史書美對「華語語系研究」概念的定義，見下方討論）以及語種間的歷時性壓制、換位關係是否可用具有（後）殖民性的「語系研究」概念含攝之？需直接面對的問題便是本文設定的「台灣重層語系研究」的詮釋效力與邊界問題。也就是說，「台灣重層語系研究」研究的範圍、適應性多廣，或其邊界為何？文本中採用多語創作，如鍾肇政的二二八小說《怒濤》使用了現代中文、日語、英語、客語、河洛話（卻缺乏原住民族語言）等表意系統，是為多語言研究亦或可以扣連為「語系」研究？另外，在台灣與擴散至台灣境外的陳雷二二八書寫如《百家春》（中文）、《永遠 è 故鄉》（河洛語創作）、《鄉史補記》（河洛語創作）是否可歸屬於「台灣的重層語系研究」？最後，「台灣重層語系研究」與華語語系在台灣、台灣的日語語系研究的差異性為何？這些提問是否跟殖民性的語系研究有文本與框架上的接合（articulation）可能？這些是筆者在構思「台灣重層語系研究」時延伸出的問題。本文擬先以台灣重層殖民語系研究的典型——日語——出發，再回頭探討台灣語系研究

³ 見次節討論。

⁴ 關於多元語言研究與語系研究的差異，見次節討論。

的隙縫（抑或邊陲的）——英語（語系）與南島（語系）質素。

（二）語系 & 文化國族主義

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回應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日語（語系）的「言文一致」運動，華語語系產生了以黃石輝、郭秋生提議的台灣話文、張我軍領軍的北京話文運動。台灣日治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如賴和的台灣話文短篇〈歸家〉便已出現史書美說的「華語語系」內部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現象⁵，如華語文字表記中「囡仔」、「頭兄」、「無路用」等的閩南語音；張我軍的新詩〈弱者的悲鳴〉則以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的方式，寓意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或以日語語系與日本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間的共謀觀之，以北京話文呈現台灣人在日語語系壓制下的失聲狀態：

樹枝上的黃鶯兒呵，
 唱罷！儘量地唱你們的曲！
 趁那隆冬的嚴威還未凍結你們的舌，壅塞你們的嘴。
 唱啊！唱啊唱破你們的聲帶，⁶
 吐盡你們的積憤。

而蔣渭水的〈臨床講義〉（原文以日文寫成，本文採其翻譯為中文的版本）則明顯地在以華語寫就的版本中出現了華語語系與日語語系的交混。當然，〈臨床講義〉從日語（語系）翻譯至華語（語系）也是一大問題，筆者姑且擱置之，暫不於本文討論。文中患者正如台灣人的國族寓言，患了「前現代」（pre-modern）（相較於日本引進的現代政策）的病症。以華語表記的此篇中出現的「現住所」、「番地」、「既往症」等的日語語系符碼，顯示台灣文人表意（signification）系統除了華語語系文字語音聲系統，亦參雜了日語語系的漢字意符（signifier）與表音意旨

⁵ 〔美〕史書美（Shu-mei Shi）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頁17。

⁶ 張我軍：〈弱者的悲鳴〉，《台灣民報》第61號（1925年7月19日），轉引自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編輯委員會編：《新大學國文精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9月），頁292-293。

(signified)。學者如黃美娥與陳培豐，皆已用重層或重層殖民概念探討日本殖民地時期台灣漢文小說的多元現象，獲得豐碩的成果，在此就不多贅述。⁷ 華語語系與英語語系的交涉方面，舉新電影媒材為觀察對象，學者黃儀冠認為英語（語系）在黃春明作品改編成的電影《我愛瑪莉》中的空間、對白，相較於現代中文（台灣華語語系之一）佔據了優勢位置。黃認為即便此現象可以 Homi Bhabha 的概念如「hybridity」（混雜）與「mimicry」（番易）觀之，學舌式地帶有顛覆強勢語系的潛能，但仍無法逸離強勢語言（英語）的侵襲。⁸ 就南島語系與華語語系（特別是現代中文）間的關係而言，如劉威廷的觀察，以原住民海洋作家夏曼·藍波安為例，劉發現夏曼藉由民族誌式的書寫召喚（interpellation）⁹達悟原初神話，藉由中文書寫部署後殖民式的逆寫帝國（*The Empire Writes Back*）策略以建立達悟民族主體，亦藉由其書寫工程實踐重新定義達悟主體。劉指出，夏曼的中文書寫以「達悟羅馬拼音與漢文並列」、「對達悟語加漢文註解」、「對漢語加上括號」、「達悟修辭」等修辭技巧來消解華語語系霸權，同時召喚南島語系的達悟主體。¹⁰

在近現代的殖民史，（被殖民）語系文學的產生，如英語語系文學（Anglophone Literature）與法語語系文學（Francophone Literature）往往對立於優勢的殖民宗主國的文學，如英國文學（English Literature）與法國文學（French Literature）。在後殖民研究興起後，相較於語系文學的殖民地「邊陲」（periphery）位置，在後殖民的視角下，所謂的英國文學與法國文學多半帶有帝國主義中心或語言本質主義（language essentialism），強調其文學作品的經典性（canonicity）與語

⁷ 如黃美娥專書《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與期刊文章〈「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之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主要討論「日本文學」在臺灣漢語文言之小說中的跨界行旅狀況）；陳培豐專書，《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見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2月）；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之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第28卷第2期（2010年6月），頁363-396；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出版社，2013年8月）。

⁸ 黃儀冠：《從文字書寫到影像傳播——台灣「文學電影」之跨媒介改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2年9月），頁250。

⁹ 此處使用 Louis Althusser 的召喚概念。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LB, 1971), pp. 115-116.

¹⁰ 劉威廷：〈The Colonial Palimpsest in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An Example of Syaman Rapongan's Writing〉，《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5期（2017年10月），頁305-364。

言上的純正性，功能上可供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es）¹¹操作，用以在殖民地教化與規訓（discipline）被殖民者，進而在常民生活（everyday life）中促成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的轉換。而需要強調的是，以上的英語（語系）、法語語系、日語語系文學，以及相關的後殖民研究，多半是植基於殖民者宗主國語系與被殖民者語系的二元的權力、語系架構之上，並非如台灣具有的多層次的、重層的殖民和語系架構：如印度英語語系文學拉出的由印度作家以英語書寫的文學（被殖民作家其書寫多半被歸屬為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與殖民宗主國英國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在印度書寫的英國殖民文學（殖民宗主國作家多半被歸屬為 English literature）；亦如日治時期張文環等台灣作家以日文書寫的殖民地文學與島田謹二等日人作家的外地文學。總而言之，台灣在經歷了多重殖民、語系後，筆者認為在台灣各種語系研究框架浮現出一個綜合性的談法的可能性，也就是將台灣特有的多元語系文學研究，無論是在台灣行之有年的華語語系研究、日語語系研究、南島語系等文學研究匯歸一處。如同英語（語系），（台灣的）南島語系研究也是一個有問題的字眼，畢竟後者並未具有殖民與霸權性格，在多語系的台灣，它反而處於一個底層的（subaltern）與被殖民的位置。而當今的台灣南島語文學（或謂台灣原住民文學）往往需要嫁接於其他語系，使用其他語系作為表述工具（如英文羅馬拼音、日文、現代中文等）。可以說，南島語以及英語分別處於台灣重層語系研究光譜的兩端，卻也是此研究框架不可或缺的特異質素。

根據劉威廷的觀察，殖民重層（colonial palimpsest）意指：

每個殖民（後殖民）分層同時經由侵蝕與吸收造成，相合於台灣的累層的殖民歷史脈絡。它提供一種（複數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其佔位（position-taking）可以互相置換的理論架構，也因此殖民的、去殖民的、後殖民的文學生產的認識論需要以歷時性與共時性方式視之。¹²

¹¹ 此處使用 Louis Althusser 國家機器概念。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LB, 1971), pp. 140, 141, 136-37.

¹² 劉威廷：〈The Colonial Palimpsest in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An Example of Syaman Rapongan's Writing〉，第 25 期，頁 305-364。筆者自譯。

筆者在此論文基於此認識論，將台灣的混雜語系現象納入討論，用以探討重層語系在台灣境內的相互間的壓制、翻轉，以及其擴散到境外，並歸返至台灣的歷時性與共時性現象。而此些現象皆與翻譯研究晚近的操縱學派與後殖民論述緊密扣連。如巴斯涅特（Susan Basnett）與烈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操縱學派提出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相關概念，認為翻譯研究應超越原文與譯文間的「對等」（或曰譯文應忠實於原文），反而應注重譯語系統中的脈絡（context）、改寫（rewriting）、操縱（manipulation）、贊助者意識形態（sponsor's ideology），對譯者進行對譯文某程度的「折射」（refraction）與改寫（rewriting）採取正面評價。¹³翻譯研究的文化翻譯與後殖民論述見於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霍米巴巴（Homi Bhabha）與維努蒂（Lawrence Venuti）等人。史碧娃克以精神分析角度出發，史碧娃克認為翻譯者精神上應避免複製殖民者的意識形態。霍米巴巴承襲其後殖民「第三空間」概念，在翻譯研究上提出「不可譯性」。¹⁴維努蒂認為異化（foreignization）翻譯比起歸化（domestication）翻譯更能保留異文化的「異國感」，避免歸化翻譯策略淡化他者文化、於譯入本複製文化霸權。¹⁵因此，本論文除了討論語系間的動力，亦談及文化翻譯面向。

以下筆者就「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概念，敷演語系研究與認同之間的關係。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中，根據安德森所言，同質而空洞的時間概念具有穿越時間，凝結民族想像的功能：「一個社會學的有機體依循時曆規定之節奏，穿越同質而空洞的時間的想法，恰恰是民族這一理念的準確類比。因為民族也是被設想成一個在歷史之中穩定地向下（或向上）運動的堅實的共同體。」¹⁶而一個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的語言，在與安德森所言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結合成印刷語言（print-language）後，恰好是傳播（dissemination）此歷時性與共時性的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的基

¹³ 廖佳慧：《翻譯理論：學習與思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8月），頁37-58、82-107。

¹⁴ 〔澳〕皮姆（Anthony Pym）著，賴慈芸譯：《探索翻譯理論》（臺北：書林，2016年10月），頁219-248。

¹⁵ 廖佳慧：《翻譯理論：學習與思辨》，頁37-49。

¹⁶ 〔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5月），頁70。

石。¹⁷就此而言，語系可謂是一個民族表述、接合自身主體性的工具之一。然而，當一個族群產生離散（diaspora）現象，其民族認同所植基的語言也有可能產生轉換與替代，而這便是此論文所欲拓展的語系研究真空——台灣語系及其再現的記憶敘事如何藉由英語語系在美國文學場域表述其離散經驗。部分台美人在戒嚴時期於美國生根落地，楊小娜便是嫻熟運用英語的台美人第二代，而這群台美人（特別是第一代）可以說在強調二二八事件的政治光譜上相異於華美人（以 1949 年外省族群與留學生為主）的離散敘事。¹⁸根據楊在《綠島》〈致謝〉的自身說法，這本書為虛構作品，但在家寶故事線的參照上採用「彭明敏、劉宜良（江南）跟陳文成的經驗，以便了解國民黨政府過去用來控制挑戰者的各種法律內跟法外的機制。」¹⁹這群離散台美人的認同機制與集體記憶便是黃茂善所觀察到的「遠距民族主義」（安德森所言）產物：「在台美脈絡下來看，《綠島》承載台美人建立台灣主體性，打造新國家的遠距民族主義、離散的情感結構。」²⁰

回到重層台灣語系其一的華語語系研究，相較於文學文本中的混雜語言研究，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在史書美與王德威等人的引領下，可謂近年來華文文學場域用以探討中文相關語言傳播過程中所產生的殖民與後殖民現象的研究。史書美定義的華語語系研究，如其所言：「指的是在中國之外、以及處於中國及中國性邊緣的文化生產網絡，數百年來改變並將中國大陸的文化在地化」²¹，定義一個以中國為殖民霸權中心，華語語系擴散到境外的語系的地緣流動概念。而近來，鑑於台灣的多重殖民歷史以及多重的文化分層，似乎也考量到台灣學者華語語系研究者的回應²²，在「華語語系研究」的基礎上，史書美鑄造了「華語語系台灣

¹⁷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f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06), pp.37-46.

¹⁸ 此華美人的離散研究可參見簡政珍：《放逐詩學：臺灣放逐文學初探》（臺北：聯合文學，2003 年 11 月）。

¹⁹ 〔美〕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著，謝靜雯譯：《綠島》（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11 月），頁 527-530。

²⁰ 黃茂善：〈遲來的，後殖民？《綠島》、歷史敘事與遠距民族主義〉，「朝向台灣『新文學』：2019 台灣文學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論文」（台灣文學學會主辦，2019 年 10 月 19 日），頁 298-311。

²¹ 〔美〕史書美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頁 17。

²² 詹閔旭與徐國明除了強調並敷演華語語系的在地特色，更強調一個多地共同構成的海外華語語系社群視角。見詹閔旭：〈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以馬華文學的台灣境遇為例〉，《台灣文學學報》第 30 期，（2017 年 6 月），頁 81-110；詹閔旭，徐國明：〈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台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糾葛〉，《中外文學》第 44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25-62。

文學」一詞：

台灣主要的華語，包含所謂的國語、閩南語、客家語，而這三種語言又和西方的英語，或本地的原住民語，產生不同程度的混合，日本殖民時期則結合了日語，殖民地漢文、帝國漢文等使台灣的華語語系文學表現為多語言、多文化的狀態。華語語系台灣文學所彰顯的便是在這種特定的、在地的、多重語言文化混融與碰撞下的產物，也因此對中國文學文化的正統性產生某種質疑的力道。²³

史書美這樣的讀法似乎暗示了一種多語言混雜、多語言重層的研究可能。然而，史書美所言的「台灣的華語語系文學表現為多語言、多文化的狀態」、「華語語系台灣文學所彰顯的便是在這種特定的、在地的、多重語言文化混融與碰撞下的產物，也因此對中國文學文化的正統性產生某種質疑的力道」概念並未脫離以華語語系為主要觀察對象與操作文本的架構。換言之，就史書美的觀點而言，在台灣的華語語系即便具有跨語系實踐的現象與研究框架，但史尚未納入其研究實踐，主要聚焦於華語語系內部範疇討論。

啟發於史書美的討論，我們可以相當明顯地注意到在台灣混雜語言間，翻譯扮演一個語言間的文化互相協商（negotiation）的角色。無論是較為狹窄定義下的源語到目標語間的翻譯，或是較為廣泛定義下文化間的對譯，如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戰後文學場域變遷引發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重置而造成的各種翻譯現象，以及更深層的戰後初期「被詛咒的一代」之本省籍日文作家的「譯腦」現象（如曾巧雲討論的林亨泰、龍瑛宗、葉石濤、鍾肇政之後殖民跨語狀況）²⁴、或是李育霖觀察夏曼·藍波安創作中的翻譯元素「達悟聲音的介入又將為漢文字表記得華語語系表述帶來何種衝擊，以及造成多大的變異？」²⁵以上的這些觀察，都指

²³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6月），頁135。底線為筆者所加。

²⁴ 曾巧雲：〈從譯腦到殖民地經驗的再翻譯——初探跨語世代的後殖民翻譯〉《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2期（2011年4月），頁135-161。

²⁵ 李育霖：〈華語語系的前沿地帶〉《華語語系十講》（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6月），頁253-294。

向一種在台灣場域內及其外的跨語系研究構和翻譯研究的潛力。

從混雜語言研究到語系研究，所面對的境遇可以說是將多重語言所處的共時平面加入各自跨時的歷史因素。班雅明於〈譯作者的任務〉提及各個語言（碎片）間，²⁶透過翻譯，具有一種後巴別塔式的互斥又互補的親族關係：

至於諸語言間的親族關係，其特徵在於一種明顯的重合性。因為不同的語言彼此從來不是陌路人。它們相互間不僅有著各種各樣的歷史瓜葛，更在先驗的意義上通過它們所要表達的事物而勾連在一起。²⁷

姑且不論其凌駕於所有語言之上的後設「純語言」之預設是否植基於德國浪漫主義下的猶太教神秘學，²⁸班雅明側重歷史向度的馬克思翻譯哲學補充解釋了本研究欲納入的後殖民歷史維度。也就是說，臺灣境內及其境外所交涉的各個複數語言間（此動力來自離散或翻譯）透過翻譯產生一種回聲，而進入（後）殖民語系式的跨語系模式。

承上，筆者所定義的重層臺灣語系研究，意指在多重混雜語言的表象上，探索文學作品中的多語質素在歷時性與共時性視野觀照下，經由後殖民相關動力（包含內部殖民、後殖民、重層殖民）與跨境動力（如離散、翻譯）影響下所產生的語系研究。在當代視角的橫切面，語系研究（如英語、法語、華語）乍看之下處理的僅為共時性的多元語言議題，或僅作文學多元語言研究。然而，將臺灣重層後殖民的歷時性以及跨境動力納入視野後，如同觀看中南美洲克里奧語（Creole language）的模式，就必須從多重（multiple）「語言」的糾葛轉換為重層（palimpsestic）的「語系」範式。而其光譜不僅僅聚焦於狹義的二元殖民—被殖民或後殖民範式，也應將跨境的、跨時的準殖民（quasi-colonial）縫隙（inbetweenness）語言與重層殖民現象納入關照光譜，而不限於語系文學的狹義定義—是否曾經在臺灣發生過殖

²⁶ 班雅明認為原作和譯作，猶如同一個瓶子（「一個更偉大語言的」）可以辨認的碎片。〔德〕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王斑譯：《啓迪：本雅明文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12月），頁112。

²⁷ 〔德〕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王斑譯：《啓迪：本雅明文選》，頁104。

²⁸ 胡功澤：〈從德國浪漫主義看班雅明〈譯者天職〉〉《外國語文研究翻譯專刊》創刊號（2006年6月），頁53-76。按本文，僅神秘學或文學作品具有「可譯性」。

民。²⁹筆者認為台灣戰後英語可視為一種具有準殖民性格的「語系」，雖然美國政府並未直接治理臺灣。如此節前段所述，黃儀冠對黃春明作品改編的《我愛瑪莉》電影的觀察：「不過改編成電影影像之後，大量英文對白，以及添加一段外商公司以英文面試的場景，強勢語言的英文仍然佔據發言位置……」。³⁰英語在戰後臺灣的美臺經濟援助脈絡下，可以說是從通用語（lingua franca）的世界「語言」上升到（準殖民）的「語系」姿態進入台灣場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場域佔據優勢位置。也因此，本文將英語視為臺灣重層語系的特異研究光譜，並不將之排除於研究框架。簡言之，本文所指的臺灣重層語系研究，旨在探索臺灣場域交涉的複數重層語言，以及在（後）殖民權力架構下，複數的語言在臺灣內部產生殖民與被殖民現象，或離散至海外場域，或又歷時性再歸返台灣場域。

以另一特異的研究光譜為例——南島（語系）為例，其並未具有殖民者優勢位置的歷史。反之，臺灣原住民的南島語系文化原為臺灣的最初文化分層，在重層的殖民文化以及其餘優勢語系壓制下，成為臺灣土地上被屢屢殖民（甚或被離散）的文化分層，至今（在大部分情況下）仍須借用華語語系在華語語系為主導的文化場域來表述、召喚（interpellation）自身之主體。如游霸士·撓給赫、夏曼·藍波安等原住民族作家，即便以中文出版著作，仍以羅馬拼音方式的音聲特質強調其自身與華語語系相異的主體性。³¹基於此原因，如同對英語（語系）的處理，本文亦將南島語（系）文學納入臺灣重層語系研究的視野。

綜上，重層台灣語系研究框架或可拓展以下視野：1. 擴展臺灣文學的多/重層語系面向，檢討臺灣在地重層漢語霸權。（特別是針對台灣原住民，可參考加勒比海文學的多語系面貌。）2. 重新檢視臺灣中心論如蔡培火「臺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其實是日治時期臺灣多重語系中華語語系一支的論述。3. 較為有效處理臺灣特殊脈絡，在重層殖民境況下，臺灣多語/重層語系文學內部與外部互相侵蝕、换位、驅逐、離散、再嫁接等現象，並非華語語系文學能有效解釋之。如吳濁流的漢詩、日文、中文書寫與轉換，就非帝國漢文以及日文間的二元語言框架能有效解釋。反離散的重層暗示離散的霸權體制落地生根，如國民政府與中國文學體制接合

²⁹ 臺灣戰後的日語亦具有此種性格。

³⁰ 黃儀冠：《從文字書寫到影像傳播——台灣「文學電影」之跨媒介改編》，頁 250。

³¹ 見游霸士·撓給赫《赤裸山脈》、夏曼·藍波安《八代灣的神話》等著作。

於後日治台灣，銀鈴會、錦連等日語語系作家的滯後效應（hysteresis），³²指向多語的台灣語系的成形。

本論文聚焦在重層臺灣語系的音聲流動上，也就是觀察楊小娜《綠島》中根植於台灣經驗的殖民創傷與歷史敘事（二二八事件），如何經由英語（語系）的表述與召喚，將被表述的經驗藉由跨境與跨時的翻譯回返臺灣當今的華語語系文學場域。

（三）國族寓言中的音聲

以詹明信的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觀察，詹明信認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必要是…寓言式的，特別是，他們被閱讀為我所說的國族寓言。」臺灣文化場域目前早已逸離詹明信一文的冷戰結構脈絡，也無法被安穩地框定在所謂第三世界的文本。然而，臺灣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在事件的發生當下與其後的冷戰、美援情境，都使其音聲表述必要嫁接在台灣與其境外的話語傳播體系，尋找（或不尋找）歸返臺灣境內的契機。若以詹明信國族寓言式的說法而言，相較於戰後霸權的華語音聲，當時臺灣語系中被宰制語系壓制的音聲（如臺語、客語、原住民族南島語等、英語、日語）都可看作一種具反殖性格的（臺灣）國族寓言音聲。舉例而言，在日語語系境遇下邱永漢以日語寫成的《香港》（獲得日本直木賞大獎）便是一例，小說中的〈香港〉、〈檢察官〉皆描述二二八事件，在當時臺灣的華語市場無法出版，必須迂迴地借用日語並在境外日本才能獲得表述。吳濁流的《無花果》則是另一例，而其所借用的語系則是中文。根據張良澤的說法，《無花果》在 1968 年分三期連載於吳濁流創辦的《台灣文藝》雜誌，雖然最後一章提到二二八事件，可能因為發行量有限，並未被國府文檢單位查禁。1970 年林白出版社的單行本馬上被查扣。1983 年在美出版（中文形式），1984 年回臺，在臺灣地下流傳，1988 年，解嚴後一年，在臺灣公開出版。可以說《無花果》借用宰制文化資本——華語語系（的中文）——表述，在政治場域與文化場域規則的流變影響下，

³² 就滯後效應而言，布爾迪厄視其為一個負面觀念，認為此乃舊世代依然維持其集體慣習，因此與新世代的集體慣習格格不入。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78.

此文本從合法到非法，從雜誌連載到單行本，從台灣到美國再回返臺灣，可以說是描寫臺灣民族創傷主題書寫宿命的重層式語系表述的另一途徑。舉另一例而言，陳雷這位在加拿大定居落腳的臺裔作家，其《百家春》（中文）、《永遠在故鄉》（河洛語創作）、《鄉史補記》（河洛語創作）等作品或多或少都以二二八事件等臺灣民族（或平埔族）創傷為主題，其國族寓言的音聲，由早期的中文到後期標定的河洛語作為表述媒介，可以視為另一種多音聲的歸返。相較於前，楊小娜的 *Green Island* 到《綠島》，就其臺美人社群世代身份與其落地生根後以英語創作的角度而言，可以說是種離散書寫與族群創傷書寫的綜合體，作為在美臺美人社群的代言人，藉由離散社群主流英語語系書寫回溯其台灣國族創傷的集體記憶，得到一種淨化（catharsis）效果。

筆者此文之思考得益於史書美華語語系概念甚多，然而，鑑於臺灣場域的重層殖民歷史承載的多語語系交涉現象，實非也應非單一語系範式（mono-phone paradigm）如華語語系、日本語系、英語（語系）所能獨立解決。即便華語語系擴展其自身的多聲、複音面向，如史書美所言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³³如涵攝華語（Sinitic）語言概念下的客語、閩南語等方言，也強調華語語系研究的反殖民視角與肯認並納入臺灣在地南島語系的獨特性（如上引用史書美之論點），但仍為以中國性（Chineseness）為對話中心、以中文語境的單語系書寫文本、媒材為主要關懷的研究，即便其強調以中國境內的一文多音（如《臥虎藏龍》中的北京標準官話與其他數種漢語口音³⁴、跨境至（中國）海外產生流變，卻尚未產生跨語系的跨境實踐。另一方面，史書美所引的巴赫丁所謂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概念，亦為單一語系內的範式，即便是敘事模式上藉由嘉年華式的跨階級狂歡與對權威中心敘事的顛覆，並未產生重層語系模式中，各語系在政治變遷下可能產生的佔位（position-taking）變化。如在臺灣的重層語境下，華語語系在清帝國時地位上升，在日治時期下降，甚至在皇民化時期遭貶低、禁用，而在國民政府時期北京語躍升為國語。

³³ [美] 史書美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頁 17。

³⁴ [美] 史書美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頁 17。

二、Green Island 與《綠島》的對比分析

（一）言說、所指、音聲的凸顯 vs. 書寫、能指的消解

筆者首先就《綠島》小說中的幾節為例，陳述《綠島》小說反映出的台灣重層語系研究相關的幾個面向，首先討論《綠島》中明顯的語音中心主義（phonologisme/phonocentrism）³⁵與音聲議題。二二八文學的相關書寫，自 1947 前後以來，已經歷不同世代、文學風格的變遷。而二二八事件相關的學術研究（文學、電影、美術等），也已累積可觀的學術成果。而廣義地說，創傷主題的小說，或是創傷主體，在台灣的一些創傷文學作品中，如《無語的春天——二二八小說選》選集中諸篇對音聲、言說的運用（如〈黃素小傳〉中瘋女黃素的失語）、原住民族作家瓦歷斯·諾幹的〈霧社〉詩中運用羅馬拼音達成呈現原住民主體的召喚（interpellation）策略、以及游霸士·撓給赫《赤裸山脈》序中運用羅馬拼音與在各篇中運用山林鳥聲召喚異質於華語語系的國族想像。在這些創傷主題小說中，言說/意指的地位，相較於文字書寫/意符，往往會被凸顯。在戒嚴時期的特殊脈絡下，書寫／能指（signifier）往往成了構陷他人的表意符碼，壓制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再藉以入人於罪，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話語進行複製（reproduction）的顯意過程（signification process）。與之相反，無論是無名女敘述者在事件當下或之後的懺悔，許多場景中話語/所指（signified）、音聲的再現皆揭示一種在場（présence）³⁶的效力。這些國族式的、透過音聲表述的後創傷（post-traumatic）再建構策略，其對重回音聲、重回在場策略的側重雖然不見得與西方形上學傳統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甚或結構主義並行，卻往往正是朝向與德希達解構主義相反的方向。

解構（後結構）學者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對語音中心主義的抨擊，來自於其與西方形上學傳統連結的邏各斯（理道）中心主義（logocentrism）：

³⁵ [法]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著，張寧譯：《書寫與差異》，（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8 月），頁 400。語音中心主義此書採「phonologisme」。

³⁶ [法]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著，張寧譯：《書寫與差異》，頁 398。

指出被壓抑本能重現的那種症狀形式即是糾纏著歐洲話語的那種書寫隱喻，是在對印跡的本體神學中排斥存有的那些系統性矛盾。對書寫的壓抑即是對那種威脅了在場及對不在場之控制的東西的壓抑。……指出邏各斯語音中心主義並非一種哲學或歷史錯誤，西方甚至是世界哲學史意外地、反常地墜落其中，而是必要地、必然有限的一種運動和結構：它是普遍象徵可能性的歷史（它比人與動物之別，生物與非生物之別更在前）；是延異之歷史，也是作為延異的那種歷史；³⁷

西方形上學者普遍認為言說（口頭音聲）優於文字表述，言說（speech）帶來的在場反應了講者與其思考同步、講者與受眾間的理解能夠有互相確認的程序。相對立而言，書寫則容易產生意義上的誤讀、歧義與無法確認性。就語言學上的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間的表意關係（signification）來說，以德希達德角度觀之，他所不滿的：便是西方形上學提高言說，也就是提高所指/言說的地位，將所指與意義（meaning）連結，而形上學將能指/書寫地位貶低，認為書寫帶來的是對作者意義的壓抑、延誤、誤解。

與德希達解構主義對音聲的看法相反，在《綠島》的表意結構中，可以察覺到作者藉由語音中心主義與音聲議題來回返、重現現場。女性敘事者雖沒有書寫體系上的名字，但其敘述聲音卻能出入本書的五個篇章：臺北 1947-1952、臺中 1958-1972、柏克萊 1979-1980、臺北 1982-2003、尾聲。書寫反而成了一種能指無盡的指涉運動——一種官方文告檔案其無法企及真相的隱喻。

《綠島》小說中第一人稱無名女敘事者的父親職業為受日本教育與訓練的蔡姓台灣醫生，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僥倖餘生。敘事者其後在美攻讀英美文學的大學生，後嫁給台美人教授，涉入黑名單事件。就無名女敘述者而言，其在書中經歷的各種場域所使用的語系亦經歷重層變遷：懵懵懂懂的日語、台語、現代中文（北京語）、英語。下引段落中，無名氏的女性敘事者「我」將日治時期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大將，亦為主張「用母語做文，用母語做詩，用母語寫小說，用母語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的黃石輝拉出：³⁸

³⁷ [法] 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著，張寧譯：《書寫與差異》，頁 398-399。

³⁸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伍人報》，第 9-11 號，1930 年 8 月。轉引自中島利郎編：《1930

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

如果爸爸當初選擇文學或藝術之路，可能會注意到作家黃石輝寫的這段話，但他選擇了醫學。我們則是藉由測試暗喻來判讀一首詩，在一行詩的格律裡找出心跳，在空白裡尋找意義。爸爸需要碰觸，需要糖尿病患吐息中的甜度，心臟瑕疵瓣膜裡的雜音；需要看到肌膚的發黃。他的世界是具體的。…「我受的訓練是西醫，」爸爸平穩地說，試著軟化有時會跑進中文裡的日語口音。³⁹

《綠島》英文版以 Times New Roman 字體行文；正文處對字體的強調處以斜體處理。中文版本《綠島》正文以新細明體行文，強調處運用粗體；特殊音聲以楷體行文（如蔣介石文告⁴⁰、作家黃石輝的台灣人宣言、法文⁴¹、書末「致謝」）。*Green Island* 英文版在楔子處：中文字體採新細明體，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 字體行文的斜體或正體分別標示歌詞、詩句以及歌名詩題。以翻譯研究的操縱學派（manipulation school）概念而言，此中文版本《綠島》譯者謝靜雯藉由字體的操縱（manipulation）來構造英文作者對敘述聲音的再現差異，並輔以譯注來標示英文原文某些字詞的脈絡（context）。從以上對字體的操作，可以發現譯者謝靜雯進行了某些程度的「改寫」（rewriting）以符合譯者設想的文化對譯。⁴²藉由黃石輝的語音中心主義傾向的主張所暗喻的臺灣國族主義與「我們」等透過書寫的文學研究者的文學心緒產生差異，而其父則為不時流露日本口音，接受日本教育的學術菁英。「我們」字面上除了指涉學術工作者，另一方面似乎也藉由黃石輝之例為對比，指涉如敘述者追索二二八事件真相的文字工作者。後者只能藉由文字檔案、書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年），頁1。

³⁹ 〔美〕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著，謝靜雯譯：《綠島》，頁63。

⁴⁰ 〔美〕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著，謝靜雯譯：《綠島》，頁63。

⁴¹ 〔美〕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著，謝靜雯譯：《綠島》，頁85。

⁴² 基於原作與譯本間的對比分析，本論文於此小說之某些段落之呈現保留英文原版與中文此版的字體差異，以凸顯原作與譯作間、台美人作者與台灣譯者、美國英文場域與台灣中文場域間的諸般差異。下同。

寫，去拼湊「爸爸」那個多語系世代的在場經驗。

另一方面，若以語系研究觀點重觀黃石輝的「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主張，在面對與殖民的國家機器接合的日語（語系）以及北京話文（如張我軍）的侵襲時，黃石輝與郭秋生等援引「在地/在地化的」（local/localised）彰泉閩南語系，換言之，以華語語系中的河洛言說作為對抗日語言說的文化資本。言說，可以說帶來了在場的效力，比起文字，音聲更能與民族想像與建構接合。以翻譯角度觀之，鑑於中文譯本用語如「頭戴」「腳踏」「所看」「如椽」等詞語以及語法皆與黃石輝原版雷同，筆者推測黃石輝此段名言在 *Green Island* 中由作者楊小娜直接翻譯為英文，在中文版由翻譯者謝靜雯直接擷取黃石輝的原文中文，而選擇不再將之由英文翻譯為中文，也就是不採取重譯（relay translation）。然而，中文譯本採用「台灣」而非「臺灣」；中文譯本採用「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而非「亦應該去寫臺灣的文學」。此二細微處的差異，或許是譯者為之，或為排版時的異動，筆者不得而知。就「台灣」改為「臺灣」觀之，鑑於《綠島》書背亦採「台灣」，或許是因為文化場域規則的變遷，相較於 1930 年漢文出版品採用「臺灣」，而現今出版場域規則多採用教育部認定的異體字「台灣」。然而，日治殖民史上，台字紋章可謂是日本總督府為台灣設計的徽文。承上對於「台灣」、「臺灣」文字翻譯時的糾葛纏結，英語語系的「*Therefore, your powerful pen and your colourful pen should also be depicting Taiwan*」（譯者以斜體標誌此為黃石輝之原語）中的「*Taiwan*」似乎以語音的在場性免除了跨國場域書寫文字上翻譯的爭議。

不穩定的書寫相較於在場的話語，在白色恐怖脈絡下寓言式地造成了蘇明國的入獄。當蔡醫師與蘇明國，書中的二二八「革命英雄」碰頭，前者表達遲來的、讓後者銀鐐入獄的懺悔。而蔡醫師的構陷信書寫，並不能讓蘇明國「感受到」其本意：

「他們告訴我，」「不寫就不能再見到孩子，」爸爸說，「我試著用一個方式寫，讓你知道那不是我的語氣，你感覺不到嗎？」

「我也有孩子啊。」他說。...

蘇伯伯捲起袖子，露出手腕跟前臂，越過桌面伸來。皮膚有好幾處都皺縮起來，呈棕色，散佈著曬傷跟鞭痕似的傷疤。...

「請不要再來找我，」蘇伯伯說，「我對你無話可說。」⁴³

可以說此段落再次將書寫—這種瘋狂的能指的運動—與國家機器的側重書寫治理的白色恐怖結構接合在一起，成了德希達所言的「西方甚至是世界哲學史意外地、反常地墜落其中，而是必要地、必然有限的一種運動和結構」。⁴⁴

（二）重層語系雜音

多語系的共時性在場之再現，往往是文字為主的書面翻譯的挑戰。中文譯者如何以華語重現當時的多語系音聲？而作者將多語系雜音（cacophony）並陳，延續前節關於語音中心主義的討論，楊小娜這樣特意為敘事者父親安排的場景似乎蓄意製造一種各種語系音聲—主體性（subjectivity）並陳的在場性。在此虛擬的場景，各種語系音聲在此空間產生重層效應。曾經的日語殖民霸權音聲退位（被刮除），卻又被敘事者的記憶部署（若隱若現）；英語（語系）的美國星條旗歌曲肯認華語語系音聲在台灣的合法性：

幾千個人因為滿懷期待而腸胃翻攪，擠滿了悶熱的會議廳——一年半以前，日本人就在同一個空間裡簽署放棄這座島嶼。爸爸擠在眾人之間。新總督的手下各踞領導的一側，好似一排肅穆的法官端坐台上，槍聲在門後的廣場上啪啦作響的時候，他們依然一派淡定。爸爸注意到，即使總督陳儀將軍並未露出笑容，但微胖的臉龐卻一副饒有興味的模樣。站在會議廳地板上的人們，脫下外套、捲起衣袖，提出了要求。

「釋放誤補的市民！」

「終結武裝巡邏！」

「恢復通訊！」

「真誠協商：別再派軍隊！」...

爸爸用穩定的視線跟聲音，談起了蔣總司令跟美國之間的友誼。他說既然民

⁴³ [美] 楊小娜 (Shawna Yang Ryan) 著，謝靜雯譯：《綠島》，頁 209-210。

⁴⁴ [法] 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著，張寧譯：《書寫與差異》，頁 399。

主國家出錢資助對抗共產黨的戰事，中華民國也應該在這座島上施行同樣的原則。他主張，台灣人有權在新政府裡擁有代表。那個星期，美國式民主的修辭不絕於耳，甚至有卡車到處高聲播放美國國歌〈星條旗〉。...在那片騷亂中，有個聲音唱起歌來：「勝利的星條旗將飄揚.....在自由的土地跟勇敢的家園上！」

幾天過後，爸爸將會發現，美國對這場島嶼動亂的回應是：「這裡現在是中國了。」⁴⁵

此節作者將日本官員（日語語系）、敘事者之父（日語語系與華語語系）、陳儀將軍（華語語系）、美國歌曲（英語語系）拼湊在一起，仿若塑造一種重層式共同體，亦或巴赫丁式的嘉年華與眾聲喧嘩。然而，這樣的後二二八眾聲喧嘩場景不過只是一種不和諧雜音（cacophony），並不具有多重音軌互相對位、互為表述的功能。在此二二八事件調解委員會的會場，藉由音聲的在場性，暗示殖民者遺緒與各種新主體可能的在場。也藉由音聲與主體性連結的在場性，暗示在場群眾的集體慣習（habitus）⁴⁶仍保有布爾迪厄所謂的遲滯現象/滯後效應（hysteresis）。⁴⁷也就是說，在場群眾之所以會在場並天真地與陳儀行政官署進行「調解」，乃是來自其內化的日本世代集體慣習，也因此對無法適應新中國式政府統治方式，其後這些台籍群眾與菁英遭到逮捕。可以看出美國對中華民國在台灣治權的肯認是透過星條旗歌曲或是「這裡現在是中國了」等話語音聲展示——即便頒布一般命令第一號（General Order No.1）的麥克阿瑟將軍並不在場（也無需到場）。值得注意的是「This is China now.」中斜體的「China」中文譯者僅翻譯為「這裡現在是中國了。」並未對中國加上粗黑體。這或許是譯者並未去體察斜體的「China」在英文裡作者所欲帶有的不確定感，特別是在二戰後初期，中華民國在台灣地位尚未穩固之狀態。

⁴⁵ [美] 楊小娜 (Shawna Yang Ryan) 著，謝靜雯譯：《綠島》，頁 28-29。此處底線為筆者所加。

⁴⁶ 彭尼維茲解讀慣習為：「一個持久的傾向系統，是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獲得的。」[法] 彭尼維茲 (Patrice Bonnewitz) 著，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10 月），頁 100。

⁴⁷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78.

(三) 跨語系、跨場域翻譯

跨語系的音聲/文字翻譯亦是筆者在《綠島》小說中觀察到的重層語系特色之一。Governor-general（殖民地總督）一詞可以說是英語語系文學（Anglophone Literature）的伴生詞。相較於「血統純正」的盎格魯薩克遜的 English Literature（英國文學），英語語系文學（Anglophone Literature）如同 Francophone Literature（法語語系文學）皆帶有殖民地派生的「外地文學」色彩。若以翻譯的角度詮釋英文與中文讀者的接受效應，中文本此處 governor-general 的命名（naming）由譯者謝靜雯翻譯為「總督」而非國民政府二戰後通用的、字面上較為中立的「行政長官」，增強了陳儀及其背後國民政府的殖民色彩以及翻譯中的異化（foreignisation）效果。對英文讀者而言，governor-general 這樣的英文用字自然地將陳儀視為一殖民新總督；⁴⁸然而，對華語讀者而言，正如「一年半以前，日本人就在同一個空間裡簽署放棄這座島嶼」的暗示，「陳儀總督」一詞則易於直接與日本殖民總督接合。此外，以俄羅斯形式主義（formalism）的角度觀察，「陳儀總督」而非「陳儀行政長官」的翻譯可以說或多或少地對臺灣華語當代讀者造成了奇異化（defamiliarisation）與震驚（shock）效果。至於譯者為何對「governor-general」寧採異化的「總督」而不採歸化的「行政長官」，或許是對全書的理解之後做一種對美國場域規則的直接翻譯——以美國視角將陳儀視為一位殖民統治者，而非國民政府視角下的一位較為中立（甚至除罪化）的行政長官，而採取韋努堤（Lawrence Venuti）的異化策略。⁴⁹

小說開頭〈綠島小夜曲〉的翻譯可以說是中文譯者謝靜雯鑑諸美國英語語系、臺灣華語語系兩個場域差異所做出的譯註策略的演示。英文版原文為：

這綠島的夜已經

這樣沉靜

⁴⁸ Shawna Yang Ryan, *Green Isla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6), p.19。

⁴⁹ 根據廖佳慧的觀察，相較於歸化翻譯，英語世界透過翻譯將異國風味抹除，韋努堤將異化翻譯視為一種抵抗英語世界的霸權心態，抵抗「種族歧視、帝國主義，以及本國文化強加在外國文本上的民族中心暴力」。廖佳慧：《翻譯理論：學習與思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頁44-45。

姑娘啲妳為什麼還是默默無語

This green island night

Appears so peaceful.

Darling, why are you

Still silent?

—“GREEN ISLAND SERENADE”

(TAIWANESE LOVE SONG/SONG OF RESISTANCE)

中文版本則譯為：

這綠島的夜已經

這樣沉靜

姑娘啲妳為什麼還是默默無語

—〈綠島小夜曲〉（台灣情歌/反抗歌曲註）

英文原版中文在前（中文文字採新細明體），英文翻譯在後。中文版本（中文文字亦採新細明體）直接將此互文式（inter-textually）的跨語音聲刪減為只剩下中文。就翻譯倫理的忠實（信）與通順（達）而言：對華語讀者而言，譯者刪除英文，而僅保留中文，合乎通順的原則，畢竟〈綠島小夜曲〉本來就是中文歌曲，若蓄意追求形式上的忠實（信），中文讀者反而會覺得畫蛇添足、不夠自然。然而，就異化與歸化角度而言：對英語讀者而言，原文英文並置中文凸顯作者以及文本本身的異國情調；然而，對台灣華語讀者而言，這畢竟是一本美國英語場域傳播回臺灣華語場域的作品，刪除了中英對照，符合了歸化翻譯的目的——讓中文讀者覺得自然流暢，另一方面，卻將此文本的跨語系流動、離散質素一併消滅。

有趣的是，譯者謝靜雯對歌詞採用譯註加註（gloss）與改寫策略：「原曲並無『反抗』之意。而當初的『綠島』也非指火燒島，多為後人附會。」就筆者觀之，翻譯者的刪減英語策略削減了讀者原在美國英語語系場域可以得到的雙語並置的奇異化效果，也消滅此小說跨語系流動的標記（從臺灣的歌曲翻譯為英文，再由美國場域以英語語系出版）。此外，少了英語語系的表音功能，這樣也讓語音中心主義與文字書寫間的拮抗降低，也就是說，降低了本書凸顯的語音一言說間的差異主題。其次，譯者將此曲、綠島分別降格為中性的臺灣情歌、放回不帶有政治獄島色

彩的臺灣島。這樣的譯者的言說介入，又顯示了臺灣華語語系場域添補（supplement）於英文原文的延異（différance）效果。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將國族獄島之國族寓言從火燒島放回、擴充到整個臺灣島，這或許又隱隱切合楊小娜 *Green Island* 全書的意旨。

（四）官方半文言文告的聖化

相對於前節多語系併陳的音聲演化出的雜音場景，下引此段蔣介石的半文言官方修辭卻造成一種單一音聲的權威、規訓效果：

務希台省同胞深明大義，嚴守紀律，勿為奸黨所利用，勿為日人所竊笑，冥行盲動，害國自害，切望明順逆，辯利害，徹底覺悟，自動的取消非法組織，恢復地方秩序，俾臺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樂業，以完成新台灣省之建設，始能無負於全國同胞五十年來為光復台灣而忍痛犧牲艱苦奮鬥也。

那天，為了給予總司令的話應得的待遇，爸爸教我的兄弟姊妹怎麼摺紙飛機。⁵⁰

此段為文言、白話夾雜的二二八事件後的蔣介石文告，於三月十日飄入敘事者家中也發放至街上，而「每張紙都印著相同的內容」。敘事策略上，敘事者插入一段單以華語語系中半文言的官方文告，造成一種布爾迪厄理論（Pierre Bourdieu）所謂的對官方言說聖化（consecration）的效果。⁵¹與前段的日語語系、華語語系以夾雜方式呈現相較，此處的單語語系呈現，降低了混語造成的雜音（cacophony）效果，加強了華語語系中的中文言說的正統性。然而，「每張紙都印著相同的內容」

⁵⁰ 〔美〕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著，謝靜雯譯：《綠島》，蔣介石文告處為楷體，摺紙飛機之處中文版本為新細明體，頁 33。

⁵¹ 布爾迪厄認為必須以合法性來體察聖化（加冕）的例子：包含儲存象徵物品的資本（如博物館）、能夠確保施為者複製教養氣質的某些機構（如教育制度）、博學的社會圈子、文學社群、評論、畫廊。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2-14.

以及其半文言宣告文體卻又同時宣告一種翻譯的失效（官方華語語系）——特別是對受日語教育的敘事者之父與其他台灣人世代而言。爸爸教孩子將蔣介石文告摺紙飛機的動作雖然暗示一種抗議的姿態，但卻也表明在戰後的華語主導的場域，並無日語語系存身的空間。而敘事者父親的世代所面臨的正是那種無可翻譯的失語狀態。

（五）全知觀點&不可譯性

根據蘇碩斌的觀察，楊小娜在第一人稱敘事觀點與全知視角間巧妙切換，將個人創傷與其父及國族集體創傷結合：

利用第一人稱，可以交代個人經驗的荒謬和情感的複雜。但作者不愧專長創意寫作，會巧妙地在段落之間跳到第三人稱，以全知的觀點當起了歷史教授，把當時個人無從察覺、必須很久才能解密的暗黑史實，全盤呈現給現在的讀者。⁵²

此般的運用類似魯西迪以魔幻寫實手法於《午夜之子》書中敘事者的視角移動，在現實與過去的英軍屠殺印度人民屠殺場景、史料間穿梭。楊小娜對於情節的塑造與角色的操縱並未如魔幻寫實作家賦予情節與人物奇幻成分，但其在無名女敘述觀點（我，第一人稱有限觀點或全知觀點）與其父蔡醫師的敘述觀點（他，第三人稱有限觀點）間卻隱約賦權第一人稱有限敘事觀點與第三人稱有限敘事觀點，讓兩者具有穿梭時代並出入臺美場景的奇幻效力。敘事者或以第一人稱描述自身降生時的1947年台灣社會狀況（全知觀點）、或以第三人稱描述1952年官方版本其父親的下落（全知觀點），又或在書末以全知觀點的第一人稱回顧翻譯唐家寶回憶錄以及其自身、父母、丈夫、家寶的後1947創傷史。⁵³

諷刺的是，無論在臺灣或臺美人所在的美國場域，經歷這些擴張人稱至全知視角的回溯歷程，或者說在這些有限敘事觀點加入後見之明的研究者成分後，二二八

⁵² 蘇碩斌：〈婆婆海洋上的綠島，平凡人的白色恐怖名字〉，<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210>，瀏覽日期：2020年10月10日。

⁵³ [美] 楊小娜 (Shawna Yang Ryan) 著，謝靜雯譯：《綠島》，頁25、83、524。

事件創傷者們的故事（藉由無名女敘事者再現）依然保持在後創傷的中間地帶（inbetweenness）與失語（「不可譯性」）狀態；借用霍米·巴巴的後殖民語言，也就是移民（或移民書寫）在異地遭遇到的文化翻譯情境。在此狀況，離散者的境遇無法被準確以目標語翻譯，或創傷者與原鄉的文化牽連也可能是一種「抗拒完全融合」。⁵⁴ 這樣的失語狀態除了可放在《綠島》中的女主角「變成臺美人」的境遇下分析，亦可放回台灣本島不同語系間具有「不可譯性」的國族創傷經驗。舉河洛語與北京語之間文化翻譯為例，《綠島》再現二二八事件中林江邁的在場卻失語狀況：「她只懂一點點中文，但是不用懂中文就能解讀他們傲慢的臉孔，或是沒收她香菸的貪婪雙手。她脫口就是一聲抗議的吶喊。人們轉過身來。」⁵⁵ 以日語語系與華語語系間的文化翻譯為例，蔡醫師在大東亞戰爭時期加入軍隊，船艦離岸時他以日語呼喚：「Rippani shinde kudasai, rippa ni shinde kudasai, please die beautifully...」，⁵⁶中文版採取日語語系與華語語系的交混，現身於 2016 年台灣華語市場。⁵⁷然而，這樣的日語語系交混華語語系言說一寧願美麗地為日本天皇現身死去的台籍蔡醫生——卻在軍隊中遭受種族歧視，臺籍與日籍醫師仍有差別待遇。先遭日本軍隊徵召，後經歷二二八事件。操習日語的蔡醫生可謂遭逢重層語系創傷狀態。全知敘述者在蔡醫師經歷的二二八事件、擔任日本軍醫經歷、二二八事件間來回切換。在曼谷擔任日軍軍醫時，敘事者描述「像他這類的安靜疾病就遭到遺忘。…他真希望有什麼宣言可以作為救贖，像是天皇陛下萬歲！這樣的話語，表示他死前依然忠心耿耿，心繫帝國。他闔上雙眼，用意志力催自己入眠。」⁵⁸接續於此，全知敘事者運用音聲讓蔡醫生的內心獨白快速轉換至二二八事件：「一聲槍響，讓爸爸在台灣驚醒，中間那些歲月轉眼消失不見。他還在鄉下那間房子裡，周圍就是那些囚犯同伴。又一聲槍響。他抵著衣櫃側面，動彈不得。」⁵⁹在蔡醫師二二八事件的經歷尾聲，媽祖這位神祇在創傷現場卻無能出聲：

⁵⁴ [澳] 皮姆 (Anthony Pym) 著，賴慈芸譯：《探索翻譯理論》（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6 年 10 月），頁 222。

⁵⁵ [美] 楊小娜 (Shawna Yang Ryan) 著，謝靜雯譯：《綠島》，頁 11。

⁵⁶ Shawna Yang Ryan, *Green Island*, p.36。

⁵⁷ [美] 楊小娜 (Shawna Yang Ryan) 著，謝靜雯譯：《綠島》，頁 11。

⁵⁸ [美] 楊小娜 (Shawna Yang Ryan) 著，謝靜雯譯：《綠島》，頁 53。

⁵⁹ [美] 楊小娜 (Shawna Yang Ryan) 著，謝靜雯譯：《綠島》，頁 54。

衛兵命令他們四人在房間中央坐成一排。爸爸仰望媽祖被燻黑的臉龐。她就跟他們一樣一直靜默不語；她的緘默是她不朽的第一個徵兆。根據傳說，最後一個徵兆是他在二十八歲那天，登上高山，在那裡看見光芒穿透大地之後，她消失於雲端。她無語的抵達與離去，奠定了她的傳奇。漁夫把她當成守護神；⁶⁰

在此段落，媽祖的無聲成為 1947-1987 年間二二八事件成為臺灣場域政治禁忌的歷時性隱喻。以語言的歷時性變遷角度觀察，無聲的媽祖或可象徵操持臺語的臺籍民眾。其在大東亞戰爭期間因皇民化運動而「失聲」；戰後，臺語或是臺語歌曲，特別是二二八事件後，如陳培豐的觀察，在國民政府的北京語主導場域規則中集體「失語」。⁶¹蔡醫師妻子習畫，卻壓抑她的作畫興趣。《綠島》小說此段彷彿讓施並錫畫作〈串綁的冤魂〉現身，受難者在場的創傷透過聲音串接起來：

士兵刺穿他的右手，他咬牙切齒，汗水滾落臉龐。他等待他之前承諾別人會發生的那種無感。不，原來他錯了。那種痛楚以焦灼的熱氣搏動著，讓他不禁扭動背部。他每一抽搐，其他人就出聲抗議—每個哆嗦都沿著鐵絲迴盪下去。⁶²

（六）一張可以反覆刮除重寫的羊皮手稿：華語語系的擴散、日語語系的遲滯與英語（語系）化身歸返

在《綠島》的「1971」章節，英語，或者說美國為主的英語（語系）及其背後輻射的美國夢與美國符碼，可以說逸離單純的語言結構而開始以一種冷戰時的美臺經濟援助下的殖民通用語（lingua franca）的準「語系」姿態進入本書的表意結構。篇章中開始頻繁出現美國大兵的英語、基督教語彙、美援物資。敘事者我的二

⁶⁰ 〔美〕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著，謝靜雯譯：《綠島》，頁 55。此處底線為筆者所加。

⁶¹ 陳培豐：《歌唱台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臺北：衛城出版社，2020 年 12 月），頁 111-125。

⁶² 〔美〕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著，謝靜雯譯：《綠島》，頁 56。此處底線為筆者所加。

兄，依靠替空軍基地清掃營房維生，替美國大兵仲介娛樂服務，被美國大兵暱稱為「喬伊」。⁶³有趣的是，從美回台與敘事者相親的柏克萊博士生小偉，以其留美的海外英語（語系）視野以及對二二八事件的海外觀點，重新「翻譯」而戳破此時仍保有中國人意識敘述者的意識形態與國民黨版本的官方二二八事件認識論，國民黨政府掩蓋的二二八受難者傷亡數字、真相始末、強暴婦女等細節，都經由小偉的話語揭露，敘事者我的當下反應是「他很粗俗」。⁶⁴敘事者在一次跟友人去酒吧的經驗後，因為騎乘由一位名為山姆的美國男人機車回家，遭到母、姊的道德規訓，視之被惡靈附身。母、姊為其每天禱告。在山姆的機車上，他想起小偉：「看看我，我在心裡對他說，這裡是第三世界嗎？佩服了吧？」⁶⁵透過叛逆式的在酒吧空間與美國人邂逅，我這位年輕的、無名的敘事者，體察到自身一個中國式的想像共同體的崩解。在面對母、姊的道德與身體規訓後，敘事者面對父親的勸戒，一位憑藉醫術在二二八事件中虎口逃生後保持沈默的「準受難者」。其父，亦仿若日語語系嫁接在華語語系，或是日本慣習嫁接於中國慣習，想板起臉來嚴肅地以日本教育標準訓斥其女，卻在其女面前現身為：

他渾身散發著那種熟悉的尼古丁味，甜膩醜陋，讓我想起那些穿著白吊嘎跟短褲，姿態隨便地趴在速克達上，停在路邊大聲叫囂，嚼著檳榔的男人。他雙眼裡原本的迷茫神情——彷彿視線所及隨時有個危機四伏的廣闊世界，多少年來已經消逝，成了雕刻般的鎮定。⁶⁶

蔡醫生的形象轉化，似乎經歷了戰前的日本菁英降格到戰後的「台灣化庶民」，其中的理想性、國際視野蕭頹於僅剩對其女的掌控。其女，或其父對質的物質介面：

我現在把目光放在桌面上，那個桌面等於是一張可以反覆刮除重寫的羊皮手稿，記載著我的童年時期：文字疊文字、數字疊數字。我用手指挖著禿木碎

⁶³ 〔美〕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著，謝靜雯譯：《綠島》，頁169。

⁶⁴ 〔美〕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著，謝靜雯譯：《綠島》，頁176-179。

⁶⁵ 〔美〕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著，謝靜雯譯：《綠島》，頁190。

⁶⁶ 〔美〕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著，謝靜雯譯：《綠島》，頁194。

片，摳著剝落的油漆。⁶⁷

這張桌子似乎隱喻著書中二二八準受難者/同謀者角色們的重層式（palimpsestically）的生命軌跡：重層式的語系、互為文本式（intertextually）的生命與國族寓言、被嫁接（grafted）的想像共同體、被侵蝕的空間記憶：就華語語系與英語（語系）間的動態觀之，自 1946 年禁用日文起（女性敘事者「我」於 1947 年 3 月 1 日出生），華語語系中的北京語中文取得了臺灣的政治場域、文化場域等的霸權地位，華語語系中的河洛語、客語，以及日語語系、南島語系等皆成為被壓制的文化資本。然而，夾帶強大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英語，強勢地化身（incarnation）在小偉這個在美國名校求學的博士生身上。⁶⁸而至 1971 年，接受 25 年中文教育以及戒嚴時期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餵養的敘事者的慣習（habitus），在面對自美返台的小偉時，相較於小偉的美國習得的「先進」慣習，敘事者慣習的遲到（belatedness），產生一種對時代變遷的格格不入，或謂布爾迪厄所言的遲滯效應（hysteresis effect）。⁶⁹而這位二二八受難者/見證後代，代表兩種語系背後各自映射出的國族寓言、想像共同體差異。林偉，一位由臺灣移動至美，再回臺的二二八見證者後代，習得自美，或謂英語（語系），習得的慣習；無名的女性敘事者，則承襲了戒嚴時期一個中國政策下的中國認同與中華民族想像。

三、結語

筆者於此論文，藉由發展臺灣重層語系研究概念，梳理其與英語（語系）、華語語系、日語語系在臺灣的折衝，並框架臺灣的重層語系現象。其中的兩個特異光

⁶⁷ [美] 楊小娜 (Shawna Yang Ryan) 著，謝靜雯譯：《綠島》，頁 194。

⁶⁸ 如前述黃儀冠對鄉土電影中英語對華語語系中中文的優勢狀況觀察。在此小說折射的台灣戰後情境，英語雖未對台灣發生過實際的殖民統治，嚴謹的定義下不應稱之為英語語系（Anglophone）。但其卻在冷戰結構下輸入美國學院式現代主義，間接地以全球化之姿主導台灣冷戰文化場域，影響當時的感覺結構甚深。有鑒於英語的霸權質素，本論文不將之排除於語系的討論框架之外，而將之視為台灣重層語系研究的間隙。

⁶⁹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79.

譜為英語（語系）以及南島語（語系）質素。英語（語系）夾雜在殖民縫隙研究框架的特異位置顯示出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冷戰脈絡時交涉時的特異位置；南島（語系）質素則標示出一個持續借用其他語系來召喚自身族群的主體策略。臺灣重層語系研究概念不僅是如詹閔旭、徐國明的共時性的「多地共構」，亦是歷時性地「多語系共構」。⁷⁰ 以 *Green Island* 與《綠島》「折射」（refraction）出⁷¹的創作與翻譯過程為例，根植於臺灣的二二八國族創傷事件的書寫生產出跨語系、跨境翻譯、回返中心（台灣）的現象。在此過程中，相對於能指/書寫的失效，在原作中，所指/言說、音聲的在場效力更為凸顯。緣此之故，譯者謝靜雯在中文版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改寫（操縱）。承上兩點，相異於德希達對歐洲話語/形上學之理道中心主義與語音中心主義共謀的批判，一種更強調在場音聲再現的多/跨語系翻譯在二二八後創傷書寫中提升其重要性。而這也是台灣重層語系研究概念相異於殖民歐洲中心話語範式的一個特徵——自南島語、臺灣話文、臺語、客語、戰後（相異於北京普通話的）臺灣腔中文，語音中心主義一直是（也必須是）文化國族主義中主體性（subjectivity）打造工程的一大工具。除此之外，繼李昂《彩妝血祭》、陳燁《泥河》後，臺美人女性作者 Shawna Yang Ryan 以及 *Green Island* 的（無名）女性敘述者也相當程度填補了二二八書寫的跨語系海外女性視角。

翻譯研究班雅明〈譯者的任務〉、文化轉向、操縱學派、韋努地異化概念、後殖民的不可譯性都與此文本的翻譯暨出版場域、內文描述的重層語系變遷（在臺或在臺美間流動）發生交涉。就國族寓言、想像的共同體、以及對主體的召喚概念而言，日語語系、華語語系以及英語（語系）間的折衝角力——無論是單語語系的聖化或是多語語系的雜音——猶如在一張可重複刮除、書寫、再書寫的羊皮紙——生產出台灣跨語系重層主體的擴散、遲滯、歸返等現象。

⁷⁰ 詹閔旭以及徐國明認為華語語系文學具有多地共構的特質。見詹閔旭：〈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以馬華文學的台灣境遇為例〉，《台灣文學學報》第 30 期（2017 年 6 月），頁 81-110 以及詹閔旭、徐國明：〈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台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糾葛〉《中外文學》第 44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25-62。

⁷¹ 借用烈菲弗爾折射概念，其認為：「一部文學作品因應不同觀眾而進行改編，意圖影響觀眾閱讀作品的方式」。廖佳慧：《翻譯理論：學習與思辨》，頁 99-100。

引用文獻

近人論著

- 中島利郎編：《193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 年 3 月）。
- 王德威：《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2015 年 7 月）。
- 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10 月）。
-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
- 李育霖：〈華語語系的前沿地帶〉，《華語語系十講》（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頁 253-294。
- 胡功澤：〈從德國浪漫主義看班雅明〈譯者天職〉〉《外國語文研究翻譯專刊》創刊號（2006 年 6 月），頁 53-76。
- 張我軍：〈弱者的悲鳴〉，《台灣民報》第 61 號，（1925 年 7 月 19 日）。
- 陳怡蓁：Trans-Generational Quests for Subjectivity: Resistance and Complicity in Shawna Yang Ryan's Green Island 《跨世代的主體性追求：楊小娜《綠島》之中的抗拒與共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7 月）。
-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出版社，2013 年 8 月）。
- 陳培豐：《歌唱台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臺北：衛城出版社，2020 年 12 月）。
- 曾巧雲：〈從譯腦到殖民地經驗的再翻譯——初探跨語世代的後殖民翻譯〉《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2 期（2011 年 4 月），頁 135-161。
-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12 月）。
- 黃茂善：〈遲來的，後殖民？《綠島》、歷史敘事與遠距民族主義〉，「朝向台灣『新

- 文學』：2019 台灣文學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論文」（台灣文學學會主辦，2019 年 10 月 19 日），頁 298-311。
- 黃儀冠：《從文字書寫到影像傳播－台灣「文學電影」之跨媒介改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2 年 9 月）。
- 劉威廷：〈The Colonial Palimpsest in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An Example of Syaman Rapongan's Writing〉，《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5 期，（2017 年 10 月），頁 305-364。
- 詹閔旭：〈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以馬華文學的台灣境遇為例〉，《台灣文學學報》第 30 期，（2017 年 6 月），頁 81-110。
- 詹閔旭、徐國明：〈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台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糾葛〉，《中外文學》第 44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25-62。
-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編輯委員會編：《新大學國文精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9 月）。
- 廖佳慧：《翻譯理論：學習與思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8 月）。
- 簡政珍：《放逐詩學：臺灣放逐文學初探》（臺北：聯合文學，2003 年 11 月）。
- 蘇碩斌：〈婆婆海洋上的綠島，平凡人的白色恐怖名字〉<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210>（2017 年 02 月 04 日），（瀏覽日期：2020 年 10 月 10 日）。
- 〔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
- 〔德〕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王斑譯：《啓迪：本雅明文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2 月）。
- 〔法〕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著：《書寫與差異》，張寧譯，（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8 月）。
- 〔澳〕皮姆（Anthony Pym）著，賴慈芸譯：《探索翻譯理論》（臺北：書林出版社，2016 年 10 月）。
- 〔美〕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著，謝靜雯譯：《綠島》（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11 月）。
- 〔美〕史書美（Shu-mei Shi）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4 月）。

- Althusser, Loui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LB, 1971).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06).
- Althusser, Loui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NLB, 1971), pp. 140, 141, 136-137.
- Bourdieu, Pierre.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Cambridge: Polity, 2009).
- Bourdieu, Pierre.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Polity, 1993).
- Bourdieu,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Jameson, Fredric.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1986), pp. 65-88.
- Shih, Shu-Mei.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ndon, 2001).
- Tsu, Jing.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Yang, Shawna Ryan. *Green Isla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6).

Palimpsestic Taiwanphone Studies —An Example of Green Island and its Negotiation of Translation

Liou, Wei-Ting* (劉威廷)

Taiwanese American Shawna Yang Ryan's English work *Green Island* is a fiction on the February 28th Incident happened in 1947. After translation, its Chinese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market in Taiwan. Inspecting from both perspectives of Sinophone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traumatic event of the Taiwanese nation, within and outside Taiwan, through palimpsestic phones, has been diachronically disseminated, displaced, and translated back to Taiwan field. An abundant facets of translation in the field filled with palimpsestic phones in Taiwan is present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phenomena—the gap of narrative and terms between the English text and Chinese translated text, different rules in American and Taiwanese field and the author and the translator's own cultural capital and position-takings, the two texts' differentiated readership, in particular the multiple languages involved in the two texts such as English, Japanese, Mandarin and Hokkien, and how the sound and parole are selectively presented after their cross-language travel. The essay particularly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the parts of the sound and the parole, as well as the gap of signification due to the translation between Anglophone and Sinophone.

Keywords: palimpsestic phones, February 28th Incident, Translation Studies, Sinophone Studie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